



父亲的晚年生活

徐林

在外工作三十年,有一个习惯从未改变,就是每年都回老家和父母一起过年。父母身体虽然还硬爽,毕竟年纪大了,做事已力不从心。然而,只要我回去,他们都很开心地为我忙碌,甚至还不允许我帮忙。让我既觉得幸福,又感到惭愧。

去年,没回老家过年。节前,我将父母接到了自己家中,也让他们享受了一个无须忙碌的年。美中不足,我住在五楼,没电梯,老人上下楼很不方便。

本以为父母能多住些日子,让我尽一尽孝心。没想到,才大年初五,母亲便跟我说:“看你又要上班,又要照顾我们,太辛苦。我和你爸商量好了,明天就回去。”我听后,有些不开心:“是儿子做得不好,怠慢你们了?”母亲连忙歉意地说:“不是,不是,是你爸爸不习惯这里的生活。”父亲一脸愧色,低着头,不吭声。

第二天早晨,走进父母卧室,发现二老正一脸兴奋地坐在床前。脚下,是早已收拾好的行李。

吃完早饭,送父母去车站。一上车,二老便催我回去。透过车窗玻璃,看着乐呵呵的二老,我这才醒悟:留父母长住,虽是孝心,却没有考虑过老人的想法。特别是老父亲,因为住在我这里,他的生活习惯已完全被打乱。

在老家,父母住的是单门独院的平房,出门就是马路,用母亲的话说,抬脚就上街了。

父亲有早起的习惯,春夏五点、秋冬六点,雷不动。起身后的第一件事是打扫庭院,庭院打扫完,再打扫院门前的路面。第二件事是烧热水,厨房的木桌上,总是整齐地排列着五六只保温瓶。尽管家中有罐装煤气,可父母还是喜欢用煤球炉,说是经济。其实,煤球炉未必经济,不过是习惯而已。

等所有的保温瓶都灌满热水后,父亲便出门买菜。菜场离家就五分钟路程,非常方便。父亲买菜既不还价,也不挑捡,就跟不要钱似的,因而买菜回来,都要接受母亲的教诲:萝卜贵了,韭菜老了。父亲总是嘿嘿一笑,说声知道啦,明天依旧如此,可谓屡教不改。

近年来,母亲有些慵懒,除用电饭煲煮饭外,像拣菜、洗菜、烧菜这些繁琐事儿,基本都让父亲去做。当然,洗碗抹盆的事儿,还是母亲做。不是母亲喜欢洗碗抹盆,而是觉得父亲做这事太马虎,母亲有洁癖,最见不得碗盆油腻不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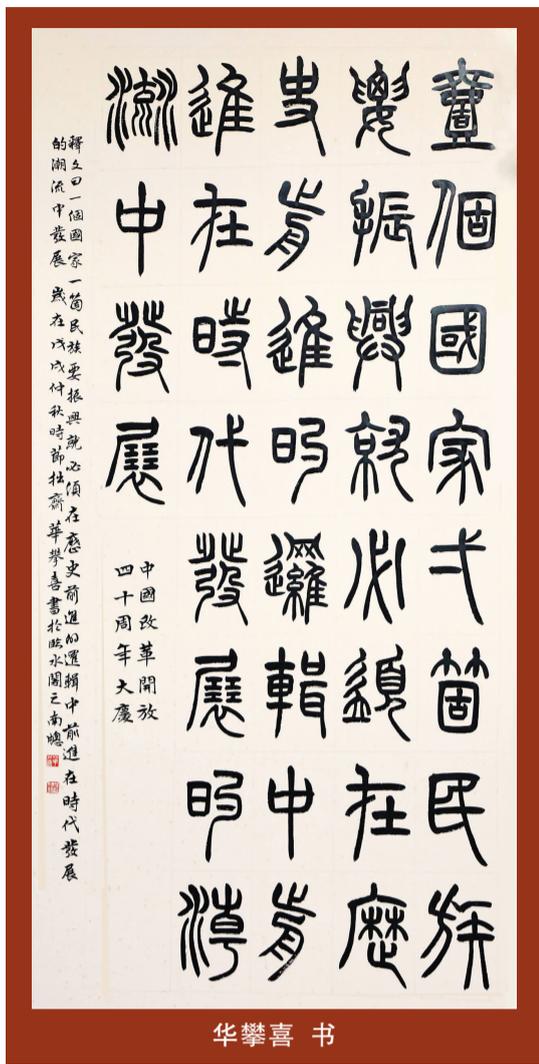
打小牌,是父亲晚年的唯一娱乐。中饭碗一推就出门,天黑后才回来。母亲对此很反感,父亲却振振有词:“不打牌,会得老年痴呆。”这种说法,想必有些道理,至少让母亲将信将疑。

喝小酒,是父亲一生的最大嗜好。年轻时,隔三差五喝一次,下酒菜比较讲究,总要去街头的熏烧摊买两样熟食回来,尤其喜欢捆蹄、蒲包肉和熏鱼。那时,父亲喝的是心情。年老后,父亲每天至少喝一顿,下酒菜很随意,有时就是一盘炒鸡蛋或者一盘虎皮青椒。现在,父亲喝的是滋味。

晚饭后,父亲一般都会去浴室洗澡。这一泡,往往就是两个钟点。泡完澡回来,没有特殊情况,便会上床休息。父亲七十岁以后,已基本不看电视,只看书报。母亲至今还保持着年轻时的兴趣和劲头,痴迷那些还没没了的情感剧,直至午夜。

一次回乡,与同学聚会,喝高了。半夜起来找水喝,发现父母卧室的灯还亮着。推门进去,见父亲戴着老花镜,坐在床头,认真地看着书。

多年来,我一直无法理解自己为何对读书有着浓厚的兴趣。此时,恍然大悟:原来遗传父亲!



华攀喜书

『骗』钱买书记

百味人生

刁顺亮

我的故乡在大运河旁的一个小村庄。那时业余生活枯燥乏味,是书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。这一切要感谢村里的一个文学爱好者。

那时,他家有我很多没有看过的书,每天放学归来,我总会去他家借上一本书。目不识丁的母亲,只要看见我在灯下正襟危坐捧着书,也就十分欣然。我曾经多少次以月亮升腾变换的位置,决定该是不是睡觉的时候了。

然而有一次,这位文学青年却不肯将书借给我了,我难过得哭了,因为他家的书在当时被戴上了毒草的帽子,为此事他父亲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,罪名是以书毒害青少年。为了能看到书,为了让自己拥有喜欢的书,我竟想到了“骗”母亲的钱买书。

那时,父亲长年累月在外打工,每当父亲向家里寄钱来时,只要邮递员叫喊母亲的名字,我总会不慌不忙地收下汇款单,尔后小心地保管好,去生产队会计那里敲上队里的公章,然后悄悄地领回那本应该属于这个家的钱。

当我将父亲寄来的钱交给母亲时,是那么地忐忑不安,母亲皱皱眉头:“噢,怎么这次……”面对母亲的疑虑,我总是巧妙地以各种理由搪塞母亲,尽管我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,第一次从父亲的汇款上“行骗”了五元人民币后,我还是害怕母亲发现我的蛛丝马迹。从这以后,我越发乖巧,以“骗取”母亲对我的信任。

等到父亲第四次往家里寄钱时,我经不住书的诱惑,这次竟狠狠地“骗”了十元。虽然母亲每次嘀咕,但我总巧妙地回答母亲的盘问。母亲是那么地慈祥善良,她万万没有想到,一个十五岁的乖孩子会做出如此令她失望的事。就这样,我一而再再而三地“骗”了三十元人民币。

为了这钱,我曾经兴奋过,更多的时候,我是在不安中度过那难忘的岁月。然而有钱得有方法买回书,后来,我利用去县城换油的机会,从当地新华书店买回了我梦寐以求的鲁迅、巴金等名作家的书。

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在一次父亲的来信中,大姐发现了“骗”钱的秘密。虽然我不承认这件事是我干的,母亲从我惊慌的眼神中,还是窥探了我内心的恐惧,我遭受了有生以来母亲最严厉的拷打。

一晃四十年过去了,我也从那个小村庄来到了大都市,我再也不用愁钱买书了,只要是自己喜欢的,哪怕现在的书价格昂贵,也毫不犹豫地买回。然而,没有四十多年前的“不轨”行为,我或许不会与书结下如此的不解之缘吧。

并非仅仅是海那边的风景

书余杂谈

庄晓明

序顾银华田凤梅长篇纪实小说合集《在海的那边》

文学金字塔的塔尖,是令人仰望的高度,但塔尖上只能站立极少极少的伟人,如西方的荷马、莎士比亚、但丁、歌德等,如中国的屈原、李杜、曹雪芹、鲁迅等,他们代表着一个民族乃至人类文明的高度。塔腰上下的名作家们,就很多了,当时的文坛,最热闹的往往就是他们,仰望他们的视线不会很疲劳,也可以不费力地上攀几步,与他们交流交心。真正容易被忽略,且人数多得难以统计的,就是塔座了。极少有评论家愿意将视线投给他们,他们的周围也往往是杂草丛生,乱石翻滚。然而,如果就此认为这塔座不重要,可以省略掉,那就又是谬见了。不仅所有金字塔的上层者,须从这里攀登上去,在另一意义上,由于这塔座的宽大,与大地保有的坚实的联系,至少能使这文学的金字塔不至于向下塌陷。

或许可以这么说,我们面对的这本长篇纪实小说合集《在海的那边》(长篇纪实小说《樱花飞舞》和《烂漫樱花,悠悠路》的合集),及它们各自的作者顾银华、田凤梅,就居于这金字塔的塔座。

两位年青的女作者都是我的扬州老乡,因为文学的缘故而有了交集,称我老师,其实,亦处于当今文坛底座的我,并不能帮助她们什么,反过来,倒是她们对文学的热情时而感染着我——在文学中浸淫既久,总免不了时有虚无的袭击。对文学的热爱,对生活的追求,不仅赋予了她们个人以独特的气质,实际上亦使得她们从平凡的乡镇女性行列中脱颖而出,文学的力量仍无处不在。在我们这个苏中地区,基层女性的命运一般是结婚生子守家,丈夫则远出他乡,或做生意或打工,支撑起

家庭的门面。但留守的女性或许更为艰辛,她们不仅要抚养孩子看护老人,往往还要在本地乡镇企业寻一份工作,挣一点微薄的工资,以补贴家用。她们就这般将自己置于艰辛而庸常的命运之中。但《在海的那边》的两位青年女作者顾银华、田凤梅,显然不愿循规这样的命运,从中学时代起,她们就喜爱文学,而文学和写作也赋予了她们不甘平庸的激情,以及对理想生活的追求。或许,在内心深处,每一个女性都有着这种对另一个世界的向往,但她们的绝大多数,往往不是缺乏行动的激情,就是被生活的磨难压垮了,而顾银华、田凤梅,终以她们的激情和行动的能力,改写了她们自己命运的轨迹。

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后,国门愈来愈打开,经济渐呈繁荣,更与世界经济联结在了一起。不仅出现了从内地蜂拥到沿海地区打工的数量惊人的民工潮,更出现了不少勇于行动的出国打工者,而与中国隔海相望的东邻日本,自成了首选的目标——日本虽经济高度发展,人口却呈老龄化趋势,非常需要年轻的打工者。去日本打工之前,顾银华是乡镇超市的理货员,田凤梅则开了一个小服装店,都处于不甘的守望之中。一个偶然的契机,她们得知了招收日本打工人员的消息,不顾家人的反对,坚决地开始了行动,试图从精神上和物质上改变自己局促的人生。

2009年,顾银华,田凤梅,这两位来自小地方的普通女性、文学女青年,通过过五关斩六将的重重测试和体检,以及艰难的日语学习,最后终于顺利过关。异国他乡的生活,显然迥异于自己的过去,但也并非向往的天堂,她们饱尝了思乡思亲的痛苦,寄人篱下的酸楚,当然,也饱尝了打工时的体力透支和不得不咬紧牙关的坚持……这一年多的打工生活,她们似乎并没有得到一个樱花烂漫的世界,然而,却各自得到了一部自己的文学作品——回国后,她们将自己曲折而复杂的东瀛打工经历,分别写成了长篇纪实小说《樱花飞舞》和《烂漫樱花,悠悠路》——或许,这才是至为珍贵的收获。

或许,以专家的眼光来看,处于文学的金字塔塔座的顾银华、田凤梅这些青年女作者,没有高瞻远瞩的文学视野,没有非凡的文学野心,没有各种时新的文学理论的影响和引导,她们只是凭着自己的天性和对文学的热爱写作,凭着女性的细腻观察和切身体会来写作,她们的写作语出天然,清新可读,有效地弥补了文学训练不够充分的不足。在她们或许并非出于主观设计的笔下,既写出了贪婪,也写出了善良,既写出了平凡,也写出了高贵,既写出了不同民族的人物,又写出了某些人类的共性,再加上赴东瀛打工本身就具有的某种传奇色彩,使得这两部长篇纪实小说具有了一种催人翻阅的魅力。

最后,我还想提示,这本纪实小说合集《在海的那边》及它的两位作者,在社会学方面的意义,或许同样令人深思。在文学的金字塔上,两位女性作者无疑是塔座,但同时,她们也是这金字塔所坐落的大地,因此,她们可谓文学与社会基层之间的媒介、粘合剂,她们的存在本身,即具有着一种意义,避免着这个社会在精神上的不断沙漠化。从作品的这一边来看,两位青年女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所写成的东瀛打工纪实小说,不仅属于文学的范畴,同样可以成为社会学家关注的议题,以顾银华、田凤梅为代表的一批女青年的出国打工经历,同样是这个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和存在,而且这个现象和存在,迥异于那些冰冷的统计数据,而有着一一种热诚的精神向度。